

土地神圣性与国家神圣性之间的博弈： 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对定居点问题的态度探析

王 昊*

【摘要】定居活动是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之一。在过去 40 年里，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一直是以色列定居点计划背后的推动力量，信仰者集团是其主要活动组织。他们把领土认同作为核心原则，把在以色列土地上定居看作救世主的活动，是救赎的进一步阶段。西奈定居点和加沙定居点的撤离造成了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观点与国家政策的冲突，人们认为结果将是暴力、血腥的对抗，然而尽管有动荡和抵抗，最终多数的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还是采取了克制的行动，国家的神圣性还是超越了土地的神圣性。

【关键词】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定居点项目；信仰者集团；库克拉比

2022 年 12 月 22 日，内塔尼亚胡组建的新政府签署协议，同意重启吞并对约旦河西岸部分领土的计划。尽管该协议中未明确提及实施的具体时间，但历来被称为是巴勒斯坦与以色列和平进程中最难消除的障碍之一——定居点问题重新回到公众视野。巴以争端的核心在于被占领土的归属问题，而犹太定居点则构成了领土归还的主要障碍。因此，在巴以和平进程的最后阶段，犹太定居点的存废与调整幅度，无疑成为决定和平能否实现的核心因素。^①

在约旦河西岸以及 2005 年之前加沙地带的定居点计划无疑是几十年来以色列政治中非常具有争议的问题。一开始只是宗教狂热者的小规模行动，截至 2019 年年底，在约旦河西岸（不包括东耶路撒冷）有 131 个合法犹太定居点和约

* 王昊，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博士生。

① 参见 Leslie Stein, *The Hope Fulfilled: The Rise of Modern Israel* (London: Praeger Publishers, 2003), 183。

110 个没有得到政府承认的定居点,超过 62 万以色列人目前居住在这些定居点中。^① 目前,定居者包括传统主义者、世俗主义者和极端正统派犹太人,但定居点项目背后的中心和动力是宗教犹太复国主义阵营。

本文着重关注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定居运动—信仰者集团的发展与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定居者和政府的冲突,特别是在 1982 年西奈定居点撤离和 2005 年加沙定居点撤离期间。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以色列国家具有深刻的宗教意义,他们的意识形态赋予了国家神圣性。然而,当国家法律限制修建定居点,尤其是下令拆除定居点时,他们又有宗教义务维持土地的神圣性,从而选择违反国家法律。对国家神圣性和土地神圣性的双重承诺产生了一种不安的对峙,在具体冲突发生时,对以色列作为通向救赎神圣工具的承诺阻止了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采取大规模的反抗政策,国家的神圣性最终战胜了土地的神圣性。

一、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关于以色列地的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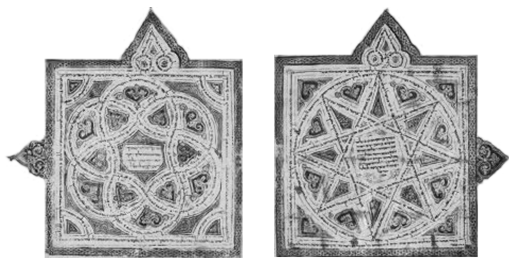
(一)宗教犹太复国主义的历史背景

伴随着中世纪欧洲反犹浪潮的肆虐和假弥赛亚闹剧的频繁上演、欧洲启蒙运动的兴起和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浪潮,越来越多的犹太人开始寻求转向政治途径来探索返乡复国的可能,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应运而生。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著作《犹太国》的出版,将犹太复国主义推向系统化和理论化,标志着现代政治犹太复国主义的诞生。^② 一部分东欧的犹太教正统派犹太人期望在保留宗教认同的前提下,实现犹太人外部现实层面状况的改善,于是变通自己的信条,从宗教的角度为犹太复国主义提供了一种合理的解释。这部分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宗教犹太人被称为“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

1902 年,瑞恩斯拉比(Rabbi Reines)成立了宗教犹太复国主义的精神中心党(Mizrachi),他和赫茨尔一样,都强调了应对当时“犹太人困境”的紧迫性。由此,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在宗教问题上作出妥协的意愿,旨在推动宗教力量参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宗教犹太复国主义与世俗犹太复国主义

^① 参见 The Israeli Information Center for Human Rights in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Statistics on Settlements and Settler Population,” *B’Tselem*, updated January 16, 2019, accessed January 16, 2024, <http://www.btselem.org/settlements/statistics>.

^② 参见 Walter Laqueur 沃尔特·拉克,《犹太复国主义史》[A History of Zionism: From the French Revolution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tate of Israel],徐方 Xu Fang 译(上海[Shanghai]:三联书店[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1992),106。



的合作在第二次阿利亚^①(1904—1914)继续深化,旨在平衡世俗多数人与宗教少数人的权益,这种政治妥协一直延续到以色列建国初期,最终演变成了在宗教事务上的“现状协议”。20世纪50年代,宗教犹太复国主义的精神中心党和精神中心工人党合并为全国宗教党,其议题主要局限于以色列国内问题,如“谁是犹太人”“守安息日”“饮食教规”等,并未对宗教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产生深远影响,在以色列国家议程的决策中也鲜有作为,一直处于以色列社会中的边缘地位。

宗教犹太复国主义的思想渊源主要可以追溯到亚伯拉罕·以撒·库克(Abraham Isaac Kook),他是英国托管时期以色列的第一位阿什肯纳兹拉比。库克把犹太复国主义与犹太教相结合,并将其解读为弥赛亚降临的前兆。首先,库克创立了“泛托拉主义”概念,即一切都是托拉。他对托拉进行了全新的诠释,提出在圣经时代,托拉被视为生活的实践指南,而非纯粹的理论研究。然而,在拉比时代则将对托拉的研究演变为为了理想生活的追求,认为学习托拉比实践和工作更可取。库克强调,真正的托拉应涵盖所有形式的神圣启示,即完整的生活,参与世俗和精神的活动都是托拉。因为“精神活动强化了实际的内容……在世界上,在生活中,以及它们所带来的一切”^②。正是精神上的活动加强了物质世界和现实世界,毕竟物质与精神世界本为一体,任何试图分割二者的观念都源于信仰与理解的缺失。

其次,库克将现实历史进程中的犹太人视为“弥赛亚一代”。他坚信,在以色列地进行实践活动的世俗犹太人,无形中充当了上帝救赎的工具。无论是否信仰犹太教,所有在这片土地上定居的人都是救赎过程的一部分。库克要求承认在定居者灵魂中的神圣驱动力,他解释说:“渴望更美好世界并为之战斗却未遵守戒律的年轻犹太人,比没有行动的正统派犹太人,具有更高水准的神圣性……世俗主义者灵魂的圣洁源泉与其宗教罪恶之间的冲突,是一个在前弥赛亚的现实世界中建设一个完美世界尝试中所不可避免的结果。”^③既然那些不完全遵守戒律的犹太人也受到了内在神圣火花的激励,那么,在以色列地上奋斗的世俗犹太人自然也是圣洁的。

因此,在库克的思想体系中,世俗犹太人在以色列地的一切活动都成为上帝

① 阿利亚(Aliyah),“上升”之意,指犹太人向“应许之地”(以色列地)移民。

② Motti Inbari, *Messianic Religious Zionism Confronts Israeli Territorial Compromis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46.

③ Stephen Sharot, *Messianism, Mysticism & Magic: A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Jewish Religious Movement*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2), 227.

救赎计划的一部分。他的思想为世俗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赋予了宗教上的合法性,使这一运动不再仅仅是世俗犹太人的事业,而是上帝促进他神圣计划的工具,是引导犹太人回归故土的重要手段。由此,犹太人建立的主权国家以色列,自然而然地获得了神圣性的地位。

(二)宗教犹太复国主义的以色列土地观

在圣经时代,土地即应许之地,意指巴勒斯坦,是上帝应允给犹太民族永远居住的一块乐土。当年耶和華与亚伯拉罕立约,将巴勒斯坦赐给亚伯拉罕及其子孙,说过:“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申命记》17:8)此后耶和華又先后对亚伯拉罕的子孙以撒和雅各显灵,重申将此地赐给犹太人。然而,历来对于以色列地的具体范畴并没有一个完全一致的界定。甚至在《圣经》中,以色列地也没有一个确切的疆界。有时疆域很大,包括整个新月沃地:“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大河之地”(《创世记》15:18);有时又较小,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巴勒斯坦之地,“从但到别是巴”(《士师记》20:1)。对此,安塔·夏皮拉总结道,“以色列地”是一个神圣的词汇,尽管其边界难以确定但归属却是明确无误。^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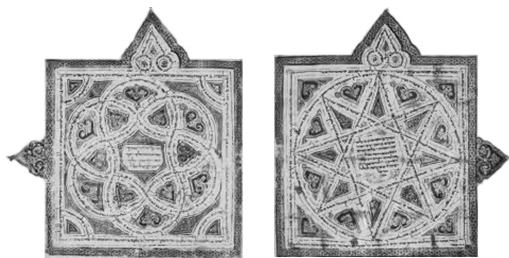
以色列人被迫离开以色列地进入流散时期,但是他们对圣地的思念与祝福却从未停止。他们自认为是寄居在异乡的客旅,心始终向往故土。在反抗罗马战争失败后,“以色列地”一词遭到禁用,并被“巴勒斯坦”(Palestine,意为“非利士人之地”)取而代之。然而,犹太人一直拒绝使用该词,并发展出以“耶路撒冷”代指圣地和著名的祝福语“明年在耶路撒冷相见”,实际上它并非专指耶路撒冷,而是泛指回到圣地之意。

总体来说,在犹太复国主义政治领袖中,没有一个人会淡化这片土地的重要性。^② 宗教犹太复国主义的库克则直接赋予了以色列土地神圣性。库克首先对犹太民族过去的流散生活进行了严厉的批驳。他认为犹太人被迫进入散居是因为他们将自己“民族的本质”与自己民族“生命的源泉上帝”分离开来,流散使上帝的观念无法影响犹太人的民族观念。^③ 而只有在以色列地,犹太人的一切才是圣洁的,他们才可以获得最大的宗教归属。其次,库克写道:“以色列的土地

① 参见 Anita Shapira, *Land and Power: The Zionist Resort to Force, 1881-1948*, trans. William Templar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ix.

② 参见 Eyal Chowers, “Israel’s Nationality Law: Reconsidering Settlement, Citizenship and Ethics in the Context of Occupation,” *Journal of Holy Land and Palestine Studies* 22 (2022): 78.

③ 参见 Eliezer Don-Yehiya, “The Negation of Galut in Religious Zionism,” *Modern Judaism* 12 (May 1992): 131.



有内在的意义”，“它与犹太人有着生命的纽带。它本身就充满了非凡的品质”。^① 他认为以色列地并非脱离犹太民族灵魂的事物，也并非仅仅是民族拥有物，而是作为团结犹太民族、支撑其物质甚至精神生存的一个工具而发挥作用。^② 因此，以色列地的神圣性同犹太人的历史命运息息相关，犹太人世代回归锡安的愿望就是犹太教独特性之所以延续的源泉。^③ 没有以色列地，也就是放弃了回归锡安的愿望，也就是放弃了救赎的梦想。所以居住在以色列土地是犹太人个人和整个犹太国家需要遵守的重要宗教义务。由此，他相信以色列的土地不仅是物质财富，不仅标志着犹太民族作为一个国家的复兴，而是神圣计划（atchaltadege’ula，救赎的开始）的实现，而这一计划的最终目的是收复整片土地。一旦整片领土得到完全救赎，犹太人民将与上帝团聚，引领全人类走向最后的审判。总之，以色列的重生代表着末世时代的开始，为世界末日的到来铺平了道路。

二、六日战争后信仰者集团的定居点活动

（一）定居点的发展

从某种意义上讲，以色列的历史就是犹太定居点在巴勒斯坦地区不断增加和扩展的历史。^④ 在以色列拥有土地，或者用犹太复国主义的术语来说“救赎土地”，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开始的目标之一，这是犹太人在民族家园巴勒斯坦获得主权的一种手段。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无论是工党还是利库德集团，都有一个广泛的共识，即把定居点运动作为一个国家的目标来推动。^⑤

① 参见 Abraham Isaac Kook, *Eretz Chefetz* (Jerusalem: Darom Press). 转引自 *The Zionist Idea: A Historical Analysis & Reader*, ed. Arthur Hertzberg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1982), 419.

② 参见 Abraham Isaac Kook, *Orot*. 转引自 *The Zionist Idea: A Historical Analysis & Reader*, ed. Arthur Hertzberg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1982), 420.

③ 参见刘精忠 Liu Jingzhong, 《宗教与犹太复国主义》[Religion and Zionism] (北京[Beijing]: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10), 200.

④ 参见殷罡 Yin Gang, 《阿以冲突——问题与出路》[Arab-Israeli Conflicts: Issues and Solutions] (北京[Beijing]: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World Culture Books], 2005), 333.

⑤ 参见 Lawrence Susskind, Hillel Levine, Gideon Aran, et al., “Religious and Ideological Dimensions of the Israeli Settlements Issue: Reframing the Narrative?” *Negotiation Journal* 21 (April 2005): 180.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4辑

在以色列独立之前,这项任务是通过购买土地和建立农业定居点来完成的。^①除了为来自欧洲的移民和难民提供住房外,这些定居点的目的是帮助确定以色列最终成为一个主权国家时的国家边界。到1947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巴勒斯坦分治决议时,犹太人已经在有组织购买的土地上建立了240多个定居点,其中包括特拉维夫等初具规模的中心城市。^②以色列建国时,定居点总数已达302个,安置了16万以上的农业定居者,全国总人数达63万。^③联合国大会分治决议不得不接受犹太人在半个多世纪中造成的既定事实,将绝大部分定居点及其周边地带认定为犹太领土,以色列国就是在此基础上建立的。^④

在以色列宣布独立和1948年战争结束后,以色列继续执行建立农业定居点政策。从安全的角度来看,定居点的存在是为了使敌军在战时难以推进,并在其他时候防止渗透。从经济角度来看,增加农业定居点将弥补由于国家独立而带来的农产品短缺。^⑤除了这些因素外,意识形态也是推动农业定居点发展的重要因素。农业定居点被认为是犹太复国主义革命的巅峰,它体现了生产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安全主义的综合价值观,表达了当时以色列国一些领导人对农业能够改变个人和社会的深刻信念。^⑥

具有特定内涵的“犹太定居点”,是指1967年六日战争后在以色列军队占领的东耶路撒冷、戈兰高地、加沙地带、西奈半岛和约旦河西岸地带建立的定居点。

早期在工党政府的统治下,这一阶段的定居点建设集中于“安全需要”,选取具有军事战略价值或促进以色列经济发展的地点建立定居点。工党的具体方针即避开阿拉伯人聚居区,在约旦河谷“安全带”、耶路撒冷至希伯伦沿线的埃齐翁集团定居点原址、“绿线”(1949年停战分界线)外围和加沙南部沿海地带均匀布点。^⑦加入定居者行列的既有以色列本国居民,也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新

① 参见 G. Lipshitz, *Country on the Move: Migration to and within Israel, 1948-1995*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 1998), 39。有关农业定居点的具体内容可参见 Chaim Gvati 哈伊姆·格瓦蒂,《以色列移民与开发百年史》[A Hundred Years of Settlement], 何大明 He Daming 译(北京[Beijing]: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1996)。

② 参见殷罡 Yin Gang,〈犹太人定居点:巴以和平另一难题〉[Jewish Settlement: Another Problem for Israeli-Palestinian Peace], 于《世界知识》[World Affairs], 1997年第3期[1997, Issue 3], 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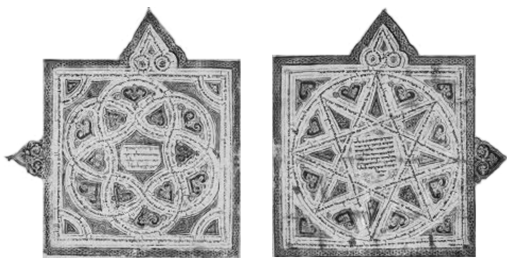
③ 参见哈伊姆·格瓦蒂,《以色列移民与开发百年史》,12。

④ 参见殷罡,《阿以冲突——问题与出路》,333。

⑤ 参见 G. Lipshitz, *Country on the Move: Migration to and within Israel, 1948-1995*, 44。

⑥ 参见 Avi Picard, “The Reluctant Soldiers of Israel’s Settlement Project: The Ship to Village Plan in the mid-1950s,” *Middle Eastern Studies* 49 (January 2013): 30。

⑦ 参见贺雅琴 He Yaqin,〈犹太定居点问题浅析〉[A Brief Analysis of the Issues of Jewish Settlements], 于《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Shanxi Dato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09年第2期[2009, Issue 2], 33。



移民。

1977年,以色列政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执政三十多年的工党政府倒台,利库德集团上台执政,定居点在安全和军事方面的意义不再被强调,定居点建设转变为“政治需要”。^① 1977年6月,贝京政府在“施政纲领”中宣布,政府将鼓励城乡居民在本国土地上定居。利库德集团主张在西岸和加沙行使以色列主权,犹太人有权在占领区的任何地方建立定居点,政府无权赶走任何定居者。^②

此外,“宗教定居点”在这一时期也异常活跃,以“信仰者集团”为代表的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积极采用各种手段推进定居活动从而满足“宗教需求”。他们出于意识形态选择对犹太民族和犹太教有特殊意义的地点定居,与现实层面的国家安全利益和发展无关。同时,因为六日战争极大地鼓舞了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更加强调犹太人对耶路撒冷和希伯伦等地的历史权利,而且认为以色列祖先的土地神圣不可出让,通过在历史家园的全面定居,犹太人将更接近获得弥赛亚的拯救。^③

(二)信仰者集团的建立

在宗教犹太复国主义成立后的几十年里,其一直都是公众关注的次要焦点,一方面在世俗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世界里被边缘化,另一方面又被犹太教极端正统派所唾弃。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中以色列军队占领了东耶路撒冷、戈兰高地、加沙地带、西奈半岛和约旦河西岸这些绿线以外的广大地区。随着历史上以色列部分土地的解放和与它们的密切接触,宗教犹太复国主义青年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们的宗教信仰不断加深,弥赛亚救赎的解释重新回到了宗教话语的中心地位。虽然以色列在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中取得胜利,但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战后,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以色列和埃及之间展开“穿梭外交”并提出了归还被占领土的和平建议。^④ 为了阻止政府返还被占领土,特别是有宗教和历

^① 参见王宇 Wang Yu,〈后奥斯陆时代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犹太定居点的新发展〉[New Developments of Jewish Settlements in Occupied Palestinian Territories in Post Oslo Era],于《国别和区域研究》[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Studies],2019年第2期[2019, Issue 2]。

^② 参见徐向群 Xu Xiangqun,《第三圣殿——以色列的崛起》[The Third Temple—The Rise of Israel](上海[Shanghai]:上海远东出版社[Shanghai Far East Publishers],1994),168。

^③ 参见 Elisa Efrat,“Jewish Settlement in the West Bank: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srael Affairs* 1 (1994): 142。

^④ 参见 Lilly Weissbrod,“Gush Emunim Ideology: From Religious Doctrines to Political Action,” *Middle Eastern Studies* 18 (July 1982): 266。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4辑

史意义的西岸^①,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开始走到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前沿,并开始带头在被占领土上建立定居点。^②在这样的背景下,1974年1月30日,信仰者集团(Gush Emunim)正式成立。

信仰者集团在被占领土上建立定居点的动机是复杂和多层次的。粗略地看,定居点项目可以被视为一种手段,在地面上建立地理人口的事实,挫败任何旨在与巴勒斯坦人进行领土妥协的政府策略。通过“挑衅的存在”,定居点项目被证明是以色列土地事业最有效的保障。^③此外,信仰者集团定居运动的意识形态核心是将他们对约旦河西岸的主张建立在“大以色列地”的概念上。对他们来说,领土已经成为他们意识形态的核心要素,取代了其他的宗教戒律,成为宗教和民族归属的基石。他们在约旦河西岸定居的“权利”被视为神圣过程的一部分。经过两千年的流亡,1948年以色列国的建立将抽象和形而上学的空间概念转变为具体的国家概念,家园领土从外国的控制中解放出来,回到了它的合法所有者手中。^④然而,领土的解放并没有随着国家的建立而停止,1967年后,这个过程将继续进行。定居点项目背后的推动力本质上是弥赛亚的救赎主义。整个以色列土地的再犹太化,被积极的宗教犹太复国主义信徒视为在当今社会中要履行的主要宗教责任,代表着对救赎愿景的实际实施。这一愿景在犹大和撒马利亚的山丘上以具体的形式呈现,以日益增长的定居点和前哨点为幌子。^⑤

库克拉比在犹太复国主义和寻求救赎之间建立了最初的联系,创造了独特的宗教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把世俗犹太人和他们的机构看作是帮助弥赛亚的到来,这种观点使信仰者集团将世俗犹太人纳入弥赛亚的救赎过程。^⑥库克拉比的儿子兹维·耶胡达·库克拉比(Zvi Yehuda Kook)则提出了一个更加具体的政治议程,他将以色列的军事胜利视为弥赛亚无可辩驳的

① 参见欧振华 Ou Zhenhua、傅有德 Fu Youde,〈信仰者集团与西岸犹太宗教—政治定居点问题研究〉[Gush Emunim and Jewish Religious-Political Settlements in the West Bank],于《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2018年第5期[2018, Issue 5],1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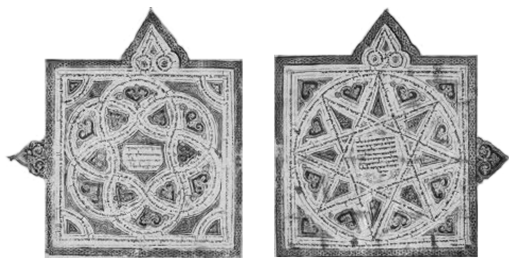
② 参见 M. Walzer, *The Paradox of Liberation: Secular Revolutions and Religious Counterrevolution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5), 274。

③ 参见 Michael Fiege, *Settling in the Hearts: Jewish Fundamentalism in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Detroit: WSUP, 2009), 21-38。

④ 参见 David Newman, “From National to Post-National Territorial Identities in Israel-Palestine,” *Geo Journal* (2001): 241。

⑤ 参见 Carlo Aldrovandi, “Theo-Politics in the Holy Land: Christian Zionism and Jewish Religious Zionism,” *Religion Compass* 5 (2011): 466。

⑥ 参见 Aviezer Ravitzky, “Roots of Kahanism: Consciousness and Political Reality,” *Jerusalem Quarterly* 39 (1986): 92。



标志,并将犹太圣地(如圣殿山和西墙)的“解放”以及耶路撒冷的统一解释为一个新解读的开始,即“大以色列地”(Eretz Yisraelha-shlema)的到来。“大以色列地”是《圣经》术语,出现在《创世记》《民数记》《申命记》中。虽然其地理范围因《圣经》经文而异(在某些情况下,它从埃及延伸至幼发拉底河),但它始终将以色列地等同于比独立战争获得领土更大的领土,包括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加沙和西岸)。自此,“大以色列地”的神话让世俗犹太人和宗教犹太人都着迷,将以色列社会的很大一部分拉向了政治救世主理想。对于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来说,占领被占土地是一种宗教义务,是民族救赎进程的一个进一步阶段。在这个过程中,民族家园领土正在被其古老的主人“解放”。信仰者集团运动通过定居的实际手段旨在防止未来从该地区撤出任何领土,从而在人民和家园领土之间重新建立纽带。通过在整个西岸建立定居点,作为扩大他们对领土控制的一种手段。以信仰者集团为旗手的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开始把以色列的领土,而不是以色列人与上帝的盟约,提升到犹太民族身份的核心要素。^① 根据他们的宗教犹太复国主义神学,在约旦河西岸定居是实现救赎的手段;宗教既创造了他们的领土目标,又为他们的领土目标辩护,因此宗教和领土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从这一点开始,土地、犹太教和现代政治之间就有了不可分割的联系,上帝、土地、以色列人民的统一,就像几个世纪前《圣经》中的以色列王国一样。^②

因此,信仰者集团强烈反对政府以土地换和平的企图,将与阿拉伯人的谈判和建立巴勒斯坦国视为对犹太民族的背叛。信仰者集团宣称,任何禁止犹太人在约旦河西岸定居的政府法令,都相当于英国 1939 年授权的白皮书,该白皮书限制犹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导致数百万犹太人在大屠杀中丧生。通过宗教和历史诉求的结合,信仰者集团利用他们的宗教权威来赢得民众支持,使定居者运动合法化。同时,信仰者集团的意识形态助长了以色列社会新型政治文化的形成。它以“犹太特选论”和神圣孤立取代了主流犹太复国主义的民族独立、“正常化”和融入世界的愿望,以一个依据犹太教法治理的神权社会的理想取代了世俗、民主、劳工社会主义的新社会的理想。^③

① 参见 David Newman, “From National to Post-National Territorial Identities in Israel-Palestine,” *Geo Journal* (March 2001): 241.

② 参见 Gwyn Rowley, “The Land of Israel: A Reconstruction Approach,” in *The Impact of Gush Emunim: Politics and Settlement in the West Bank*, ed. David Newma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5), 26.

③ 参见汪舒明 Wang Shuming、缪开金 Miao Kaijin,〈信仰者集团崛起对以色列社会的影响〉[The Impact of the Rise of Gush Emunim on Israeli Society], 于《西亚非洲》[West Asia and Africa], 2006 年第 6 期 [2016, Issue 6], 51.

三、土地神圣性与国家神圣性的对抗：西奈和加沙定居点的撤离

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定居者与以色列政府之间存在两大危机,这两次危机都涉及撤离位于1967年“绿线”以外的定居点:西奈地区的亚米特(Yamit)定居点和加沙地区的古什卡蒂夫(Gush Katif)定居点。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发现他们陷入了僵局,因为以色列这个国家被赋予了一种神圣的品质,而神圣化的国家却决定将同样具有神圣性地位的部分土地归还给阿拉伯人,这体现了国家神圣性和土地神圣性两种价值观的冲突。

(一)反对撤离西奈亚米特定居点的斗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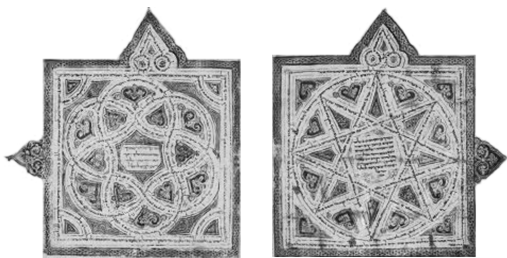
1979年,以色列和埃及签署了《戴维营协议》,该协议包括以色列承诺从西奈半岛撤军,并给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自治权。协议定于1982年9月完成西奈撤军,这意味着16个定居点的撤离,其中最著名的是亚米特定居点。

绝大多数世俗民众对协议表示支持,使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意识到政府有撤出被占领土的实际意图,从而引发了对信仰失败的严重恐惧,因为撤退被认为与救世主救赎道路相矛盾。在5300名西奈亚米特定居者中,大多数定居者是世俗的,只有70人反对撤离。^①绝大多数世俗定居者都急于与政府达成一项有利的赔偿协议然后离开。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明白他们正在打一场注定要失败的仗。然而,他们相信如果出现严重抵抗的行为,就会阻止未来任何试图撤离约旦河西岸部分领土的企图。

1981年年底,由世俗犹太人和宗教犹太人组成的“阻止西奈撤退运动”成立。因为大多数西奈定居者是世俗犹太人,对宗教狂热没有同情心。因此,信仰者集团在阻止亚米特撤离的努力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查南·波拉特(Chanan Porat)作为信仰者集团的著名代表,宣称:“铲除定居点的决定在道德上毫无意义,我在此开始一项请愿书的签名活动,我们将竭尽全力反对《戴维营协议》的实施。”^②他们在被占领土内举行了大型示威游行,通常与学校假期同时举行,以确

^① 参见 Haggai Segal, *Yamit, the End: The Struggle to Stop the Withdrawal from Sinai* (Beit-El: Beit-El Library, 1999), 23.

^② Haggai Segal, *Dear Brothers* (Jerusalem: Keter Publishing House, 1987), 44.



保有大批宗教青年参加。这样的示威在宗教社区引起了相当大的骚动。^① 他们也游说议会成员,培养公众舆论,甚至挑衅性地在亚米特地区建立了一个新的定居点,同时也教授律法课程和举行公开祈祷会等宗教活动,为抵抗运动增添了宗教色彩。^②

在亚米特撤离的最后阶段,“阻止西奈撤退运动”的支持者在亚米特地区加强了自己的力量,他们认为自己是保护真正以色列利益的先锋,但是世俗公众的支持很弱。根据阿兰的说法,随着“关键时刻”的临近,抗议活动变得越来越激烈,反撤退力量的宗教神秘主义变得越来越主导。亚米特地区“被该运动的宗教活动人士神圣化,以至于失去了它的具体实体”^③。领土从一个世俗的现实转变为一个崇高的精神本质。

在整个亚米特撤退的过程中,大约有 3000 名示威者组织起来抵抗以色列军队,他们在亚米特的屋顶上与以色列军队作战。抗议者收集了轮胎、沙袋和金属棒来面对数千名士兵。^④ 但是暴力程度远低于媒体所预测的,当士兵们试图爬上反对撤退的人聚集的屋顶时,确实发生了一些暴力行为,包括向士兵投掷物品,甚至是肉搏战,但是威胁生命的暴力行为是非常少的。^⑤

(二)反对单方面撤离加沙古什卡蒂夫定居点的斗争

2004 年,阿里埃勒·沙龙(Ariel Sharon)宣布了他的“脱离接触”倡议。该倡议计划撤离所有的加沙定居点(共有 21 个定居点,大约 8000 名居民)以及撒马利亚北部的 4 个定居点。

沙龙的“脱离接触”计划对定居点项目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威胁,远比西奈半岛的撤离更具威胁性。与世俗和务实的西奈人不同,加沙地带的大多数居民都笃信宗教,意识形态上致力于定居点项目,并经常受到救世主理想的激励。此外,西奈定居点是相对较新的定居点,而加沙定居点包括生活了 30 年的居民,他们从不同的以色列政府获得了资金和支持。因此,加沙定居者断然拒绝参加任

① 参见 Myron J. Aronoff, “The Failure of Israel’s Labor Party and the Emergence of Gush Emunim,” in *When Parties Fail: Emerging Alternative Organizations*, eds. Kay Lawson and Peter H. Merk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327.

② 参见 Arie Na’or, *Greater Israel: Theology and Policy* (Haifa: Haifa University Press and Zemora Bitan Publishers, 2001), 285.

③ Gideon Aran, “From Religious Zionism to Zionist Religion: The Source of Gush Emunim and Its Culture” (PhD diss., The Hebrew University, 1987), 42.

④ 参见 Aliza Weissman, *The Evacuation: The Story of the Evacuation of the Settlements in Sinai* (Bet-El: Bet-El Library, 1990), 333.

⑤ 参见 Haggai Segal, *Yamit, the End: The Struggle to Stop the Withdrawal from Sinai*, 209.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4辑

何关于搬迁赔款的谈判并不奇怪。

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对从西奈撤军和从加沙撤军的反应也非常不同。在西奈撤军中,参与争论和反对撤离被占领土的人主要局限于信仰者集团和库克拉比经学院的内部圈子,而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一些著名的拉比则广泛地参与了反对单方面撤离加沙的斗争。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就西奈定居点而言,撤军是以色列与埃及和平条约的一部分,该条约得到了以色列议会多数议员和以色列公民的支持。事实上,著名的宗教犹太复国主义拉比把公众对埃及和平条约的支持作为他们强烈谴责从亚米特地区撤出时激进抵抗的中心论点。^①而脱离接触计划并不是和平条约或其他国际协议的一部分,这是以色列单方面的行动,没有任何具体的政治或经济回报。同时,“脱离接触”计划也在以色列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不满,当沙龙对该计划进行表决时,遭到了他利库德党的多数成员的反对。^②另外,许多宗教犹太复国主义拉比和他们的门徒并不认为西奈是以色列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另一个有助于减轻反对从亚米特和西奈半岛其他地区撤军的因素。与西奈相比,没有人质疑加沙的古什卡蒂夫地区作为以色列土地一部分的地位。

呼吁大规模抵制撤离的宗教犹太复国主义拉比是亚伯拉罕·夏皮拉(Abraham Shapira),他是以色列前任首席大拉比,也是库克拉比经学院的领导者之一。根据夏皮拉的说法,不服从撤离定居点的命令是一种宗教义务,同时,大规模的不服从也会迫使政府放弃其撤离计划。^③除此之外,耶沙(Yesha,犹大、撒马利亚和加沙首字母缩写)理事会也发表了一份声明:“禁止任何犹太人以任何方式参与或帮助拆除以色列土地上的定居点或任何犹太财产。这片土地从所有的方面来说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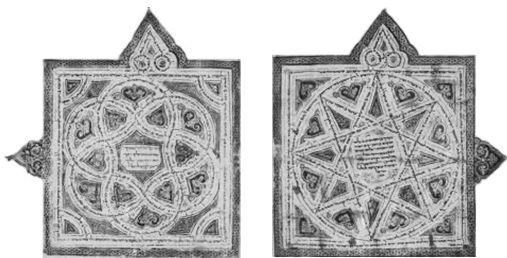
尽管与预测的相反,从加沙的撤离也没有发生危及生命的暴力事件,但是有许多消极的抵抗和拳脚相向。总的来说,加沙古什卡蒂夫定居者比公众想象的

① 参见 Eliezer Don-Yehiya, “Messianism and Politics: The Ideological Transformation of Religious Zionism,” *Israel Studies* 19 (January 2014): 253。

② 参见 Anat Roth, *Not at Any Cost-From Gush Katif to Amona: The Story behind the Struggle over the Land of Israel* (Tel Aviv: Miskal-Yedioth Ahronot Books and Chemed Books, 2014), 176。

③ 参见 Aharon Trop, “Evacuation of Jews Is a Sin: An Interview with Rabbi Abraham Shapira,” *Besheva* (2004)。

④ Moshe Hellinger, Isaac Hershkowitz and Bernard Susser, “The Dialectic between Confrontation and Commitment: Religious-Zionism and the Settlement Project,” *Politics and Religion* (November 2016): 857。



更温和^①,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们的声明也不像许多人所期望的那样好战,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并没有公开地剥夺国家及其法律的合法性。主要的情绪是一种无奈,但同时也是一种希望:加沙古什卡蒂夫之战已经失败,但更大的战争仍有可能取得胜利,这些抵抗能使将来进一步撤离的可能性降低。

(三)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定居者的克制

在1982年从西奈撤军和2005年从加沙地带撤离的情况下,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定居者领导人都认真地准备防止撤离。媒体和社会都预测定居者和军队之间会发生大规模的反抗,甚至是暴力的流血冲突。然而,这些预测最终被证明是夸大其词。在大多数情况下,宗教犹太复国主义的定居者领导人都采取了克制的行动,克制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1. 团结民主的内在价值观

定居者对撤离领土行动的抵抗是巨大的、令人难忘的,但它大部分仍停留在规范的被动抵抗范围内。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定居者所信奉的思想很容易导致暴力,因为大多数定居者认为将定居点连根拔起将阻止以色列的弥赛亚救赎,撤离定居点是一种巨大的罪恶,其无异于谋杀或叛教,甚至那些计划撤军的人也将被视为叛徒。从这个意义上说,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定居者是激进分子,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显然制造了暴力的可能性。但与此同时,定居者也深深内化了一些价值观,这些价值观起到了抑制暴力的作用。调查的定居者中,有三分之二的人相信犹太人的团结和以色列的存在比领土更重要。定居者还表现出对民主原则的强烈尊重。大多数人都表示,以色列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必须容忍广泛的意见,并同意他们应该尊重政府的决定,即使他们不同意政府的决定。^②在这种背景下,就不难理解从被占领土撤军期间没有发生对军队的暴力抵抗。

2. 实用主义的历史方法

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自以撒·雅各布·瑞恩斯(Isaac Jacob Reines)拉比建立之初就同赫茨尔一样在实用主义的框架下看待重返以色列地的问题,即犹太复国主义只是作为犹太人逃离苦难的避风港。后期尽管库克拉比将救赎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相结合,赋予了犹太复国主义宗教上的合法性,但同样倾向于与世俗

^① 参见 Joyce Dalsheim, *Unsettling Gaza: Secular Liberalism, Radical Religion and the Israeli Settlement Projec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Chapter 4.

^② 参见 David Weisburd and Lernau Hagit, "What Prevented Violence in Jewish Settlements in the Withdrawal from the Gaza Strip: Toward a Perspective of Normative Balance," *Ohio State Journal on Dispute Resolution* 22 (2006): 80.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4辑

犹太复国主义的合作,即在具体问题的实践方法上,采用了实用主义的观点。因此,才有了宗教犹太复国主义政党与世俗政党的联合,前期是工党,后期是利库德集团。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定居者选择对话而不是不服从,是因为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相信谈判比暴力能实现更多的目标。^① 因此,定居者的运动更倾向于称为“实用主义”,而不是从事无条件的宗教斗争。

3. 国家神圣性的神学观点

最关键避免了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定居者社区的大规模反抗的是支撑他们的深层神学观点。这种神学观是在耶路撒冷的库克拉比经学院犹太学校发展起来的,它把深刻的宗教救世主意义赋予了以色列这个国家、它的政府和它的军队。因此,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团体必须保持以色列的国家神圣性和它不可避免是世俗国家这一事实之间的动态平衡。理想情况下,对以色列的宗教承诺是首要的,但现实中,这个国家经常违反犹太教的律法。这种宗教责任与政府决定之间的冲突造成了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内部的紧张关系。^② 自一个多世纪前其诞生以来,这种紧张关系一直困扰着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平衡这两者成为该运动的核心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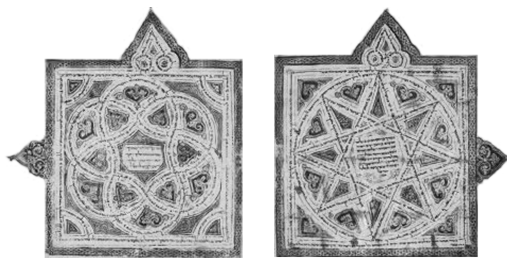
考虑到国家及其代表机构政府的神圣性,在很多情况下,国家符号就成为宗教符号。以色列国成为犹太人和上帝之间的纽带——用经常重复的话说,这是“救赎的开始”。这种政治神学在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中广泛存在,是定居点计划背后的驱动力。在大多数叶希瓦小学和高中,在每一所宗教犹太复国主义高等学习机构中都进行密集的教育努力,反复灌输以色列国家是救赎弥赛亚的特性。

反对撤离西奈定居点是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历史上第一次对国家神圣性的严重挑战。尽管如此,最后对国家神圣性的忠诚占了上风,宗教犹太复国主义阵营并没有号召一场针对国家及其机构的大规模兵变。23年后,从加沙定居点撤离对国家的神圣性构成了更为严重的威胁,在这时国家的神圣性也依旧占了上风。可以肯定的是,这不仅是出于团结民主的价值观和实用主义的原因,而且是因为国家的神圣性是宗教犹太复国主义最重要的价值观。

1982年从西奈亚米特地区和2005年从加沙古什卡蒂夫地区的撤出,这些

^① 参见 Peter Herriot, *Religious Fundamentalism: Global, Local and Personal* (London: Routledge, 2009), 104-108。

^② 参见 Moshe Hellinger, Isaac Hershkowitz and Bernard Susser, “The Dialectic between Confrontation and Commitment: Religious-Zionism and the Settlement Project,” *Politics and Religion* 9 (November 2016): 861。



失败在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中产生了一种危机感。然而,宗教犹太复国主义的大多数追随者并没有放弃他们的观念,即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以色列国是弥赛亚救赎的神圣表达。相反,他们认为救赎是一个渐进的、持续的过程,在通往圆满的道路上有起有伏。根据这一观点,他们把撤离西奈和加沙这样的事件解释为人民尚未完全成熟到可以得到救赎的迹象。^① 于是,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与其试图通过诉诸暴力和非法手段来加速救赎,更需要的是一种旨在向犹太人民灌输以色列土地神圣性的教育战略。

虽然撤离了西奈和加沙定居点,但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在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的定居活动仍在持续进行,由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出于宗教意识形态建立的定居点占据定居点总数的三分之一^②,这个数字并不令人意外,而且预计还会增长。今天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他们足够的人数和机会在国家和政府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以纠正过去西奈和加沙定居点撤离的错误,尤其是考虑到在现任政府(该国历史上最右翼的政府)的领导下,2023年6月的一项法律将新定居点的批准权从总理内阁完全转移到国防部长,现任国防部长是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党领袖贝扎雷尔·斯莫特里奇(Bezalel Smotrich)。^③ 这一决定意味着定居点推进计划现在受到“保护”,不受外部政策的影响,例如来自美国、欧盟或阿拉伯国家的外交压力。因此,仅凭国防部长的命令,定居点就可以不受干扰地继续建设下去,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可以继续推进定居运动以实现其“大以色列地”的目标。

四、结语

定居点在犹太民族历史上一直是一个复杂而有争议的问题。在以色列建立定居点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当时犹太复国主义的先驱开始在属于奥斯曼帝国的土地上定居。以色列建国后,定居点运动在政府的支持下蓬勃发展,并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后发展势头强劲。

被占领土的定居点计划是宗教犹太复国主义所带头拥护的,其最显著的活动是信仰者集团的建立及其定居活动。这些定居点通常被视为是确保以色列国

① 参见 Dov Schwartz, *Religious-Zionism: History and Ideology*, 147.

② 参见 <https://israelpolicyforum.org/west-bank-settlements-explained/>, accessed July 13, 2024.

③ 参见现任政府联盟2023年1月协议, <https://www.google.com/url?sa=t&source=web&rc=1&opi=89978449&url=https://www.ofekcenter.org.il/wp-content/uploads/2023/01/what-Israels-37th-governments-guiding-principles-and-coalition-agreements-mean-for-the-West-Bank-Jan-2023.pdf&ved=2ahUKEwiLmNydqtiG>, accessed July 13, 2024.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4辑

安全的一种方式,当然更重要的这些定居点代表着他们与古老家园的联系,是《圣经》预言的实现,是保持犹太传统和价值观的一种方式。在被占领土进行定居活动被积极的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视为在当今社会中之要履行的主要宗教责任,代表着为弥赛亚救赎而进行努力。

在面对世俗国家时,激进的宗教主义可能引发挑衅性、对抗性甚至反体制的政治行为。然而,在以色列,情况却有所不同。尽管犹太教信仰在国家行为面前屡受冲击,特别是在1982年西奈定居点撤离和2005年加沙地带定居点撤离期间,宗教信仰的力量却有效遏制了大规模的反抗运动。尽管对众多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而言,以色列的土地是神圣不可侵犯且不容谈判的,这两次大规模撤离也确实引发了社会的骚乱与不安,但值得注意的是,并未出现致命的暴力冲突。这一现象反映出在以色列,国家被视为救赎的工具,其神圣性的地位在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心中最终还是超越了土地的神圣性。